

文章编号: 1003-2053(2017)11-1737-13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郑 焯^{1 2} 吴建南^{3 4} 张 攀³

(1.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72; 2. 西北工业大学 MPA 教育中心, 陕西西安 710072;
3.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4.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进的背景下, 学界缺乏从简政放权视角展开对政府行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 以国内 45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间的关系, 并采用实证方法验证了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 简政放权可以分为减少繁文缛节(“简政”)和赋予企业自主性(“放权”)两个维度, 二者均会对企业活力及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且“简政”与“放权”的交互项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绩效。此外, 企业活力在“简政”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以及在“放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均发挥出部分中介作用, 然而其在“放权”与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基于此, 进一步总结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 简政放权; 企业活力; 企业创新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17.11.018

“简政放权”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提法在近几年官方文件中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多, 其实质是从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视角出发, 让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各就其位, 发挥出各自应有的功效。2013年5月13日, 李克强总理在召开国务院会议时指出, “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 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随后, 在2014年和2015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国家领导人都研究了简政放权, 而且在2014年召开的40次常务会议中, 有21次都部署了简政放权。由此可见, 简政放权已成为当前政府改革创新的热点议题。另外, 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 简政放权这一主题从2013年开始逐渐掀起学界的研究之热, 重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体系, 研究内容也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探讨简政放权与行政审批改革、简政放权与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与教育领域改革、经济领域改革的辩证关系等, 但遗憾的是, 较少有研究是在深入阐释简政放权的内涵与影响机

理, 且“简政放权”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当前也非常稀缺。

事实上, 政府的行为作用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来说, 是无可厚非的。得益于自身在科技创新、体制灵活性、促进就业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遍及国家的各个产业领域, 涉及各种所有制形式, 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扩大区域就业的主力军^[1]。为此, 近年来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之下, 为了促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各级地方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工作力度, 提升政府机构的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并适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支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法规, 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和减负松绑。

尽管国家领导人和国内一批专家学者提倡简政放权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创新绩效, 但就其影响机理而言目前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加以论证, 因

收稿日期: 2016-10-13; 修回日期: 2017-05-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15); 西北工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31020170QD107)

作者简介: 郑焯(1986-), 男, 新疆阿克苏人, 助理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绩效管理、政府创新、科技政策与管理。E-mail: lbxjbzy@163.com。

吴建南(1970-), 男, 陕西西安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改革创新与绩效管理、区域治理与环境政策。

张攀(1990-), 男, 河南开封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评估、科技与环境政策。

此亟需探索简政放权的内涵及影响机理并检验简政放权与企业活力及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相关证据。鉴于此,本研究从政府简政放权视角出发,在厘清简政放权、企业活力的内涵基础上,构建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实证检验简政放权的不同维度如何影响企业活力及企业创新绩效,最后在探讨研究结论的同时,提炼相关政策启示。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简政放权的内涵与维度

“简政放权”一词最早在 1984 年中央的指导意见中就有出现,当时国家经贸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简政放权的五项具体要求,主要是针对行政审批权限等方面的内容^[2],之后在 1985 年,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泰斗夏书章教授在《简政放权的必要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简政放权是体制改革中把宏观管住、管好和把微观放宽、放活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简政’必须‘放权’,‘放权’才能‘简政’,‘放权’应是问题的焦点^[3]。”随后,简政放权一词在政府公文中出现,大多是与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审批、政府职能转变等内容相联系的,而且随着国家大部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及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简政放权在近些年来逐渐成为当前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目前,学界和社会界对“简政放权”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有学者认为,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较好地改变地方政府权力与职责长期相背离的不合理的运行状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4]。还有学者指出,简政放权强调的是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5]。也有学者认为,简政放权就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6]。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最大限度减少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加快企业工商登记等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由此可见,简政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划分清政府与市场主体责任,避免政企不分,主要手段就是实现对政府“自我瘦身”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因

此,简政放权”可以从“简政”和“放权”两个维度考察:通俗地理解,“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流程,“放权”则是要把本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归还给企业,也就是说简政放权要实现的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从理论渊源上看,“简政”与国外的“减少繁文缛节”比较相似。繁文缛节(red tape)是公共管理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它是指对组织绩效有害的冗余行政规则、规章和程序,从其承受主体来看,其中一类繁文缛节是企业和公民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的^[7]。繁文缛节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比如:Baldwin 认为繁文缛节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内部与外部的之分,正式的繁文缛节来源于法律、规章制度与程序等导致的组织自由受到制约,这里组织既包括政府内部也包括政府面对的服务对象等^[8]。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大师 Bozeman 教授认为,繁文缛节可以分为组织自身感受到的繁文缛节和特定利益相关主体受到的繁文缛节两种类型^[9]。还有一些学者从政府采购、政府预算及公共组织人事管理等方面对繁文缛节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10]。另外,繁文缛节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比如 Bozeman 等从行政拖沓程度来反映繁文缛节的程度,Rainey 等从主观感知、行政拖沓和正式化三个维度来反映繁文缛节,Feeney 通过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四种不同的题项来反映哪种题项的设计更有利于准确地反映繁文缛节,Samina 从工作流程繁琐程度的三个方面反映繁文缛节的结构特征^[11-14]。本研究综合国外学者对繁文缛节的概念和维度理解,结合中国现实情境,通过修订繁文缛节量表对“简政”进行衡量。

简政放权中的“放权”可以用“赋予企业自主性”来反映,主要是指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不受来自外部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的程度。企业自主经营权在法律上体现为企业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和其他市场主体签订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和责任、企业的经营以及企业的财产等不受他人干预或侵犯。在传统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政府干预企业主要是从“政府万能论”、“主体虚无论”和“社会责任论”视角来讲的。万能论的思想来源于,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扮演着“慈父”角色,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孩子(企业)犯错了不能置之不理;主体虚无论则是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法律认可企业的主体地位,但现实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被更多认为是一种虚拟存在,是投资人的一个工具;社会责任论要求企业

要对内部成员和外部利益相关主体负责,这也就为政府干预找到了理由。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政府与市场主体各自的作用,这也就为厘清新时期政府与企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提供了依据。有学者提出简政放权、给企业“还权”包括三个方面:(1)取消投资项目备案制;(2)减少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干预;(3)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15];还有学者从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主体责任、消除多头和重复执法、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赋予企业自主性的简政放权的构成维度^[16]。基于此,本研究从企业自主经营过程和特点出发,结合现有观点对简政放权的“放权”维度进行测量。

1.2 企业活力的内涵界定

“活力”在《辞海》中将其解释为“旺盛的生命力”,“活”是指生存、有生命的、能生长,与“死”相对,“力”强调了一切事物的效能。还有一些解释是把“活力”看成是反映人体生命力状况的综合性概念,包括个体感受到的拥有的体力、情绪能量和认知灵活性等三个方面。活力的英文翻译常见的有:Vigor、Vitality 和 Livability 三种,其中:Vigor 强调的是(法律上的)效力和智力,(动、植物的)强健;Vitality 强调的是生命、生命力和持久力;Livability 强调的是存活率和宜居性,而本研究中对活力的理解更偏向于事物具有的“生命力”和“持久力”,即从外在功能和内在效应角度出发,活力可以视为事物内在所具有的良好自我维持、自我支撑和自我存续发展的能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等将企业活力界定为,“是在企业追求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中发展起来的,去追求和增强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17]”李维安教授等认为企业活力是企业进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生存力、自我发展力和再生力,它是企业生命机能强弱的综合体现^[18]。Vicenzi 和 Adkins 强调活力是具有能量或者健康的状态,企业活力能够简单地被理解为企业的健康状态或者具备的能量,取决于财务、智力资本、创新发展三个方面^[19]。根据 Gilbert 等学者的观点,发展方面是判断一个企业活力和兴衰的重要指标,增长、成功与竞争力是企业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综合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认为 Survival(生存力)、Growth(成长力)、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是衡量高组织活力的三个标准^[21]。本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拟从生存

力、可持续性、成长力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活力。

1.3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1) 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简政放权包括“简政”和“放权”两个维度,其至少从以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一方面,通过“减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流程,帮助企业节约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可以将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入到市场开拓和产品研发中,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简政放权的重点是在放权,即通过向企业放权和地方政府放权,着力解决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出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赋予企业较高的自主权,企业主体更能够结合自身定位和战略需求更好地利用和挖掘现有资源,开拓市场、研发新产品或改进现有技术和生产流程,进而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理论研究,结合简政放权的维度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 减少繁文缛节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赋予企业自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简政放权对企业活力的影响

简政放权实质上就是对政府权力行使的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其目的是为了打破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往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层面的行政审批数量众多及审批的不规范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市场和企业活力;同时,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以政府行为来代替或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抑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不利于激发企业活力。简政放权通过影响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来影响企业活力:一方面,“简政”通过简化办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间能够改变企业在战略选择时的成本收益对比情况,如根据 Davies 的观点,企业在面对政府给予的激励项目时,会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而成本之一就是来自政府所设置的各种繁文缛节,当各种成本累计大于企业的收益时,企业往往会放弃申请^[22];另一方面,“放权”通过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性,能够给予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市场变动等快速做出战略应对的更大空间。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 减少繁文缛节对企业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 赋予企业自主性对企业活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3) 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需要活力,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新、提升竞争力、维持更新能力^[23]。一方面,较强活力的企业通常也具有较强的组织资源,如企业人力资本等。当企业资源或人力资本集聚程度越高时,企业就更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并推出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主导产品和名牌产品,成为行业竞争的领头羊;另一方面,较强活力的企业通常也具备较强的与时俱进的内部文化以适应外部环境的持续变革要求。这种文化有助于为推动企业创新而营造宽松氛围的环境,让员工在组织中能充分发挥出技能,创造更多有价值的新产品^[2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 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企业活力对简政放权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作用

通过回顾企业活力以往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创新活力受到一些前置因素的影响,如已有研究表明一些非结构性因素(企业文化、资源、生命周期等)和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如政府出台的政策、政府的改革等制度环境)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过程和效果。另一方面,企业活力也能影响一些后置因素,如对组织内部员工的个人工作绩效、创造力、创新意愿等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对组织创新绩效包括研发成功率、技术转换率和新产品的销售等均有显著影响。上文理论探讨表明,政府通过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减少企业注册登记的时间和程序、放宽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等做法有助于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激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活力,而较高的企业活力则有助于企业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研发和生产、提高创新效率。因此,结合以上讨论及简政放权的两个维度,本研究提出主假设及子假设:

H4: 企业活力在简政放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

H4a: 企业活力在减少繁文缛节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

H4b: 企业活力在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

(5) 简政放权的交互项对企业活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视角来看,简政放权正

是要摆正“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定位,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有效发挥作用,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为居民和社会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中,“放权”旨在增强企业在非市场失灵领域的自主性,以便充分释放市场机制的优势。“简政”则是在保持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干预的基础上,通过减少繁文缛节、规范干预手段增强政府干预的效率与有效性。“简政”与“放权”相辅相成,具体体现为“放权”不到位,企业受到有限自主性的束缚从而导致“简政”的果实成为空壳。“简政”不到位,政府的繁文缛节会对企业造成额外成本从而限制企业在战略选择中的实质自主性。因此,“简政”和“放权”同时抓更能助力企业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a: 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 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此,根据上述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总结和梳理,结合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现实状况,本研究构建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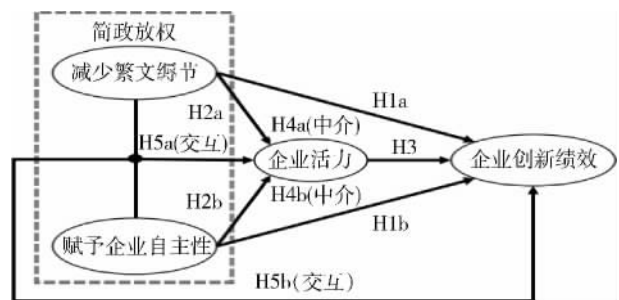


图 1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概述

由于本文所需要的数据难以通过公开资料获取和收集,因此考虑选择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本研究的问卷来源于 2015 年 8 月修订完毕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支撑研究调查”,该问卷主要有四部分组成: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创新状况、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撑、开放性问题的支撑、开放性问题的支撑,共包

含 90 个调查题项,其中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变量主要抽取于调查问卷的前三部分内容。此调查问卷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企业当前的创新状况、创新需求以及对政府各种所谓的支持行为的感知情况。为了尽可能保证调查问卷设计的科学合理,问卷设计的过程主要遵循了以下流程“文献回顾和田野调查→与本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与政府/企业等管理实践者进行研讨→小样本试测→测量题项的完善→问卷定稿。”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 样本选取与抽样框架。由于本研究的分析单元是组织层面而非个人,在实际数据获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难度,为了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更多样本量,本研究主要采用非随机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西安、乌鲁木齐、青岛三个城市以及国内其他省份地级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了保证被试填写的问卷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借鉴了 Li Yuan 等的抽样方法,选取了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运营总监、研发主管、董事会秘书等企业高管作为问卷发放对象。非随机抽样主要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述三个城市高新区管委会、工信厅、科技厅、税务局等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支持下,把问卷发放要求和收集时间提前告知他们,然后请他们配合给下辖区范围内的企业负责人通过 E-mail、QQ 群、网站登录、微信等多种在线回收方式来发放问卷。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通过相关咨询机构获取到手头现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录,然后筛选出除了上述三个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在咨询机构的配合下,对所在城市的相关科技型中小企业负责人发放问卷,也是通过 E-mail 和问卷在线链接的方式回收样本。将两种抽样方式进行结合来发放问卷,一方面弥补了整群非随机抽样方法的单一性,同时也解决了非随机抽样获取到问卷数量较少的问题。

(2) 样本质量的控制。为了尽量控制抽样随机性方面可能带来的不足,以充分保证回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1) 在企业基本信息中专门设置了“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研发人员所占比重”、“受访者所在的部门及在公司任职情况”等题项,目的就是为了排除不符合要

求的问卷。(2) 设置了问卷筛选规则,具体包括:a、根据前期问卷试测时间,在此将填写时间设置为 12 分钟^①,不满 12 分钟的问卷自动被剔除;b、通过设置 1-2 道陷阱题规则来清理掉随意填写的答卷;c、根据问卷第四部分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情况,人工进行筛选和排除不符合要求的答卷。(3) 为了避免问卷填写人会因为随意勾选、打分而导致问卷信效度偏差,特此检验了回收的问卷是否存在同源偏差(common variance)问题。在检验同源偏差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问卷涉及的所有条目同时归到统一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中,首因子贡献率为 26.8% 的方差,并且自变量和因变量载荷到了不同的因子上,因此认为本研究获取的数据可靠,可以用于后续的实证研究。(4) 对回收数据进行了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表明回收数据的整体特征符合正态分布特点,可以用于后续的分析研究。

(3) 样本的基本特征。本次问卷调查工作从 2015 年 11 月着手开始准备一直持续到 2016 年 3 月,历时近 5 个月。调研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457 份,其中包括西安、青岛、乌鲁木齐三个城市分别回收的 79 份、68 份、110 份,以及咨询机构协助发放并回收的 200 份,为了保证两种样本回收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用 t 检验对收集的两组样本进行,结果表明两种回收方式收集到的样本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可以用来进行后续的数据统计分析工作。从回收的研究样本总体来看,本次调研基本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的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调研的企业既有在高新区内的,也有在高新区外的,以高新区内企业居多,企业类型主要涵盖了电子信息、机械工业、生物技术、汽车制造、新材料、光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企业平均年龄在 8 年左右,问卷填写对象(企业负责人)以男性居多,平均任职时限在 7 年左右。样本所覆盖的企业和调研对象的基本特征信息如表 1 所示。

2.3 变量定义与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尽可能借鉴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已获认可的成熟量表,再结合本研究的特点,通过对个别企业“一对一”走访,以及与政府财税、科技等部门官员进行深度访

^① 前期对个别企业进行走访的时候,让企业负责人认真填写调查问卷,发现填写一份完整的问卷至少需要 12 分钟左右,因此将问卷填写时间设置为不少于 12 分钟的最低标准。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一览

类型	类别	数量	所占百分比	类型	类别	数量	所占百分比
企业类型 ^②	支柱产业类	167	36.54%	负责人性别	男	277	60.61%
	装备产业类	105	22.98%		女	180	39.39%
	新兴产业类	108	23.63%	负责人年龄	30 岁以下	62	13.57%
	都市产业类	77	16.85%		31 - 40 岁	254	55.58%
5 年以下	131	28.67%	41 - 50 岁		128	28.01%	
企业年龄	6 - 10 年	217	47.48%	50 以上	13	2.84%	
	11 年以上	109	23.85%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高中及以下	13	2.84%
	是	324	70.90%		负责人	大专	79
R&D 人员数量	否	133	29.10%	受教育程度	本科	294	64.33%
	10% 以下	52	11.38%		硕士及以上	71	15.54%
	11% - 20%	189	41.36%	负责人任职时限	5 年及以下	239	52.30%
	21% - 30%	113	24.73%		6 - 10 年	180	39.39%
31% 及以上	103	22.54%	11 - 15 年		30	6.56%	
2014 年 R&D 投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例	1% - 5%	131	28.67%	16 年及以上	8	1.75%	
	6 - 10%	227	49.67%				
	11% 及以上	99	21.66%				

谈 对量表的测量题项进行了反复斟酌与修改。本研究中测量问题采用国际通行的 Likert 5 级量表形式,从 1 至 5 代表程度上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并且各研究变量的测度指标(如表 2) 具体包括:

(1) 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主要借鉴钱锡红等和 Jiao 和 Koo 等开发的测量量表,从企业利润率、市场份额、产品和流程改进、新产品和新服务、管理制度创新等几方面进行测量^{[25][26]}; (2) 自变量——简政放权,其中“简政”部分主要借鉴了 Samina 和 Abdu 提出的有关繁文缛节的测量量表,结合中国简政放权的背景和内涵,最终从办理业务流程、审批时间和成本、报送材料的多少,以及整体上对减少繁文缛节感知等四个方面进行测量^[11],而“放权”的测量主要参考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5) 中的相关测量题项,最终从市场准入条件、市场主体责任、生产经营活动权力等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3) 中介变量——企业活力,主要借鉴了 Bishwas 开发的测量量表,从企业的文化塑造、自我发展、生存能力等几方面对企业活力进行测量^[18]。(4) 控制变

量——根据以往研究中发现的企业基本特征和企业负责人特征等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会产生影响,本研究特选取企业类型、企业年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 R&D 人员数量、企业负责人性别、负责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任职时限等八个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前四个变量是为了控制企业基本特征,后四个变量是为了控制企业负责人基本特征。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因子载荷值、累计解释方差的百分比、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优度指标来检验研究变量的效度,对于各维度因子的取舍则采用依泰森与布莱克的建议,取特征值大于 1,因子载荷大于 0.5,排除不合适因子载荷量,以供本研究分析之用。另外,对于拟合优度指标的建议值为 RMSEA 小于 0.05,NNFI、CFI 和 AGFI 均大于 0.9 即可。在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以 CITC 值和 Cronbach's α 系数

^② 本研究将企业类型划分为这四类,是在参考国内已有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的设置,包括:北京市科统中心 2009 年面向企业创新能力的调查,厦门市科技局面向企业创新的调查。

表 2 研究变量的命名与测量

变量名称	测度指标	文献来源	代码: 测量题项
自变量: 简政 放权(JF)	减少繁文缛节 (“简政”)	Samina 和 Abdu	JF1: 本企业在政府机构办理业务过程中手续、流程等比较简化
			JF2: 本企业办理行政审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很低
			JF3: 本企业因为政府的新政策法规实施而减少了报送材料
			JF4: 近三年来, 本企业报送给政府机构的相关材料有所精简
	赋予企业自主性 (“放权”)	中国企业家 调查系统	JF5: 本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了
			JF6: 本企业的市场主体责任强化了
			JF7: 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权力扩大了
			JF8: 本企业遭遇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现象减少了
中介变量: 企业 活力(EV)	文化塑造	Bishwas	EV1: 本企业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强烈的价值观
			EV2: 本企业对于想要做什么以及朝哪发展有着明确的方向
			EV3: 本企业更加注重长远的成功
			EV4: 本企业通过资源聚集、组织扩张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
	自我发展	Bishwas	EV5: 本企业通过创新不断拓展业务增长点
			EV6: 本企业的研发费用保持持续增长
	生存能力	Bishwas	EV7: 本企业强烈聚焦在核心业务活动方面
			EV8: 本企业将产品质量摆在首要位置
因变量: 企业 创新绩效(IP)	利润率市场份额	钱锡红等	IP1: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较高
			IP2: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较大
	产品和流程改进	钱锡红等	IP3: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产品改进与创新有非常好的市场反应
			IP4: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在行业内率先应用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服务	Jiao & Koo	IP5: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常常在行业内率先推出新产品/新服务
			IP6: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的创新产品包含一流的技术和工艺
	管理制度创新	Jiao & Koo	IP7: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的创新项目成功率较高
			IP8: 与同行相比, 本企业的管理制度一直在不断优化、改进

来验证量表的一致性信度,通常认为,CITC 大于 0.3,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等于 0.65 即可以接受,而对于尚未验证过的变量尺度,只要其 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 0.6 即可接受。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值都高于 0.5 的最低标准,此外,减少繁文缛节、赋予企业自主性、企业活力、企业创新绩效变量的累计方差百分比分别为 71.039%、68.572%、72.603% 和 70.236%,各变量的拟合优度指标均达标,整体结果反映出研究变量的结构效度较好。另外,各研究变量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研究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保持在 0.70 以上,CITC 也均保持在 0.5 以上,超过了相关研究建议所要求的最小临界值标准,因此结果表明各研究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 SPSS 21.0 对各研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表 4 显示了各研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所反映的数据分布情况较好地符合正态分布特点,为下一步数据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各研究变量的均值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企业及其负责人的基本特征状况,以及被试对简政放权、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认知情况,其中被试对赋予企业自主性子变量比减少繁文缛节子变量的认同度更高,并且被试企业的活力和创新绩效的整体状况较好(均值分别为 3.7 和 3.5 左右)。此外,从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负责人任职年限与自变量减少繁文缛节在 0.1 水平上显著

表 3 研究变量的效度与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代码	因子载荷	累计解释方差%	拟合优度指标	CITC	删除题项后的 α	α
减少繁文缛节	JF1	.706	71.039	CFI = 0.928 ,	.591	.819	0.801
	JF2	.774		NNFI = 0.965 ,	.622	.815	
	JF3	.791		AGFI = 0.920 ,	.576	.821	
	JF4	.820		RMSEA = 0.043	.524	.828	
	JF5	.781		CFI = 0.915 ,	.545	.825	
赋予企业自主性	JF6	.791	68.572	NNFI = 0.950 ,	.567	.822	0.783
	JF7	.748		AGFI = 0.927 ,	.609	.817	
	JF8	.748		RMSEA = 0.041	.537	.826	
企业活力	EV1	0.806	72.603	CFI = 0.940 , NNFI = 0.974 , AGFI = 0.948 , RMSEA = 0.060	.745	.883	0.901
	EV2	0.823			.706	.886	
	EV3	0.833			.713	.886	
	EV4	0.816			.619	.894	
	EV5	0.842			.717	.885	
	EV6	0.797			.639	.892	
	EV7	0.803			.677	.889	
	EV8	0.811			.680	.889	
企业创新绩效	IP1	0.869	70.236	CFI = 0.980 , NNFI = 0.972 , AGFI = 0.934 , RMSEA = 0.073	.732	.924	0.931
	IP2	0.837			.719	.925	
	IP3	0.822			.800	.919	
	IP4	0.840			.779	.920	
	IP5	0.798			.778	.920	
	IP6	0.833			.743	.923	
	IP7	0.841			.772	.921	
	IP8	0.786			.760	.922	

正相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负责人性别等与自变量赋予企业自主性在 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类型、企业年龄、R&D 人员数量、负责人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也与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性。从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减少繁文缛节、赋予企业自主性和企业活力均与企业创新绩效在 0.0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从大小程度来看,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而赋予企业自主性比起减少繁文缛节而言,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

3.3 假设验证结果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本研究中的各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表 5 是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各变量之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

到模型 4 是先加入控制变量,然后逐步加入简政放权的两个子变量以后,对因变量企业活力的影响,以及减少繁文缛节与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效应对企业活力的影响;模型 5 到模型 11 是考察控制变量、简政放权的两个子维度、企业活力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对企业活力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减少繁文缛节与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来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研发人员数量、被试的受教育程度和任职时限等对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从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来看,各主要变量模型的 F 检验值都是显著的,说明模型的总体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并且 R² 在加入自变量之后显著增加,这也反映出模型中引入新变量是合适的,以上模型总体上能够较好地检验各主要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具体来看:

表 4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企业类型	2.6413	1.0076	1.000											
2. 企业年龄	6.6233	2.8779	.063	1.000										
3.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0.6397	0.3448	.782	.013*	1.000									
4. R&D 人员数量	2.8690	0.9771	.024*	.116*	.231*	1.000								
5. 负责人性别	0.6543	0.4322	.012	.122	.098	0.162	1.000							
6. 负责人年龄	2.7713	1.0396	.008	-.213	.113	.208	.086	1.000						
7. 受教育程度	3.8102	1.1143	.197	-.201	.036	.073	.174	-.126	1.000					
8. 任职时限	7.2763	3.0072	.099	.196*	.073	.066	.028*	.124**	.077*	1.000				
9. 减少繁文缛节	3.4070	1.0101	.098	.013*	.126	.107	.018	.127	.076	.077*	1.000			
10. 赋予企业自主性	3.4437	0.9820	.088	.133	.098*	.201	.007*	.092	.103	.114	.488**	1.000		
11. 创新活力	3.6783	1.0090	.103*	.099*	.107	.206**	.097	-.117*	.089*	.019	.519**	.541**	1.000	
12. 企业创新绩效	3.4461	1.1024	.133	.107*	.126*	.397**	.102	.215	.177*	.269*	.447**	.456**	.558**	1.000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 5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企业活力					企业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企业类型	.005	.009	.011	.006	3.888	-.008	-.006	-.014	.012	-.011	.010
企业年龄	.012*	.004*	.021*	.008	.011*	.046*	.061*	.046*	.044*	.051*	.039*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084	.046	.065	.039	.053	.025	.043	.010	.003	.012	.017
研发人员数量	.072**	.048**	.062**	.044**	.061	.090**	.104**	.069**	.067*	.074*	.046*
负责人性别	.080	.094	.099	.093	.113	.015	.010	.076	.060	.058	.077
负责人年龄	.081	.067	.041	.028	.027	.015	.038	.051	.047	.051	.041
受教育程度	.028*	.052*	.046*	.051*	.002	.149**	.060**	.110**	.125*	.082*	.033*
任职时限	.054	.074*	.030*	.037*	.128	.016*	.025*	.036*	.020*	.039*	.018*
减少繁文缛节		.519***		.372***		.490***			.240***		.285***
赋予企业自主性			.557***	.408***			.507***			.239***	.301***
减少繁文缛节*											
赋予企业自主性				.336***							.296***
企业活力								.608***	.482***	.462***	
F 值	.599	19.282***	21.358***	20.058***	1.039	13.949***	14.014***	23.831***	25.019***	24.650***	25.327***
R2	.011	.280	0.301	0.302	0.018	0.219	0.220	0.324	0.359	0.356	0.336
Adj-R2	.011	.269	0.287	0.288	0.001	0.204	0.204	0.311	0.345	0.342	0.325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1) 简政放权对企业活力的影响。从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分析结果来看,模型 2 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企业基本特征和被试基本特征等控制变量之后,减少繁文缛节变量与企业活力变量之间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519(P < 0.01),结果验证了假设 2a,即减少繁文缛节与企业活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模型 3 的分析结果是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之后,赋予企业自主性变量对企

业活力的影响,结果也表明了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活力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557 ($P < 0.01$),在此假设 2b 也通过了验证。另外,通过模型 2 和模型 3 的显著性系数结果也可以看出,比起减少繁文缛节而言,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活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也就是说赋予企业自主性更能激发中小企业活力。

(2) 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模型 6 和模型 7 的分析结果来看,模型 6 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之后,减少繁文缛节变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90 ($P < 0.01$),显著正相关;而模型 7 的分析结果也同样反映出了,在控制相关控制变量之后,赋予企业自主性变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07 ($P < 0.01$),并且赋予企业自主性比起减少繁文缛节来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在此,假设 1a 和假设 1b 也得到了验证。

(3) 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8、模型 9 和模型 10 分别反映了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以及在加入企业活力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减少繁文缛节以及赋予企业自主性对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变化情况。模型 8 充分反映出了,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608 ($P < 0.01$);模型 9 反映了在加入企业活力变量之后,自变量减少繁文缛节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显著性降低了,由模型 6 中的 0.490 ($P < 0.01$) 降到了 0.240 ($P < 0.01$),这表明企业活力在减少繁文缛节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同样地,模型 10 也反映出在加入企业活力变量之后,自变量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由模型 7 中的 0.507 ($P < 0.01$) 降到了 0.239 ($P < 0.01$),这也表明了企业活力在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并且模型 10 和模型 9 比较而言,可以看出企业活力在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出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假设 3、假设 4a 和假设 4b 也都通过了验证。

(4) 简政放权的交互效应影响。从模型 4 和模型 11 的分析结果来看,模型 4 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之后,减少繁文缛节与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项与企业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36 ($P < 0.01$),显著正相关;而模型 11 的分析结

果也同样反映出了,在控制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后,减少繁文缛节与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项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96 ($P < 0.01$),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也表明,简政放权的“组合效应”更能促进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之下,对企业活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在此,假设 5a 和假设 5b 也得到了验证。

3.4 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分析结果的信度,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现有研究尽管围绕企业创新绩效展开了大量的实证调研,但是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并未形成共识。现有研究更多认同的是基于结果导向的 R&D 创新绩效测量^[27],而本研究针对的调研对象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根据郑刚的观点,广大中小企业除了进行 R&D 活动以外,也要进行一系列的非 R&D 类创新活动,如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28],因此本研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既包括了 R&D 创新类指标,也包括了非 R&D 创新类指标。为了评估模型的稳健性,我们采用现有学界普遍认同的 R&D 创新绩效指标作为因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选取了利润率、市场份额、新产品/新服务等三个常用指标。表 6 显示了简政放权、企业活力对企业 R&D 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当因变量是企业 R&D 创新绩效时,虽然在各模型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性有所变化,但假设 1-5 仍然可以得到支持,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依然存在。因此认为本研究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部门掌握着国家的主要决策权力,尤其是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言,政府在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活动中更具有主导性话语权,而企业的正常运营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政府部门的配给、约束和监管。因此,从企业外部视角出发,政府的行为作用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成为创新管理和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但是当前基于政府简政放权视角探讨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研究还未出现。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理论和研究文献,构建了

表 6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活力				R&D 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减少繁文缛节	.473***		.314***	.466***			.228***		.293***
赋予企业自主性		.491***	.335***		.482***			.239***	.301***
减少繁文缛节*			.286***						.293***
赋予企业自主性									
企业活力						.563***	.416***	.434***	
F 值	18.334***	21.035***	20.396***	16.949***	14.336***	23.779***	24.663***	22.650***	23.799***
R ²	.261	0.287	0.283	0.209	0.207	0.325	0.348	0.327	0.316
Adj-R ²	.249	0.263	0.254	0.197	0.188	0.301	0.326	0.308	0.297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政府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结合国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样本,实证分析了简政放权对企业活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活力在简政放权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1)简政放权的两个维度——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均会对企业活力及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比之下,赋予企业自主性比起减少繁文缛节更能促进中小企业的活力、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企业活力在简政放权的两个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简政放权通过直接影响中小企业活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比较而言,企业活力在赋予企业自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出的中介作用比其在减少繁文缛节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3)简政放权的两个维度(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间的交互项也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方面基于繁文缛节理论和企业自主性理论视角,将简政放权解构为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两个维度,推展了“简政放权”这一极具中国特色概念的测量,另一方面实证证实了在“强政府、弱市场”的当代中国背景下,简政放权对于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首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而简政放权对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启示我们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应该“跳出科技看科技”,因为非科技领域的政府部门的“瘦身”、“提

效”亦能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其次,落实简政放权工作可以从减少繁文缛节和赋予企业自主性两个方面强化。一方面,在工商、税务、财政等与中小企业打交道较多的部门,应该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大力推行“三证合一”改革,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尽量不要插手和妨碍中小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给企业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度去进行生产创新活动,以此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最后,减少繁文缛节与赋予企业自主性的交互项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两者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协同”效应,启示我们就“简政”和“放权”而言应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简政放权”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提法,国外并没有成熟的量表对其进行测量,而国内目前也未出现相关测量量表,本研究借鉴国外繁文缛节等理论对简政放权进行了探索性测量,但题项和测量工具势必会存在一些局限,需要今后进一步结合简政放权的内涵与实质,对量表进行改进和完善;(2)本文的数据仅来源于企业负责人的主观感知数据,而缺乏对简政放权实践状况、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情况客观反映的二手档案数据,而二手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测量和揭示现状,因此未来需要加强主客观数据之间的融合;(3)本文的抽样框尽管一部分来源于对西安、乌鲁木齐、青岛三个城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研,但是并未对区域特征进行控制,而且也缺乏对不同区域间现状的比较,事实上,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企业创新的简政放权力度肯定存在差异,而未

来亟需对这方面展开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 [1] 袁建红, 龚天宇, 郭进芬. 中小企业创新政策效应评价[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 40-46.
- [2] 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委正在研究“简政放权”的几项规定[J]. 经济工作通讯, 1984, (3): 19.
- [3] 夏书章. 简政放权的必要条件[J]. 社会科学战线, 1985, (3): 112-115.
- [4] 凯思. 论简政放权与加强中央权威[J]. 政治学研究, 1996, (2): 69-72.
- [5] 李津津, 余红心. 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 (1): 86-96.
- [6] 陈坤, 仲帅.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J]. 行政论坛, 2014, (6): 23-26.
- [7] 马亮, 孙晓燕. 繁文缛节的起源、特征与影响[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 87-95.
- [8] Baldwin J N. Perceptions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sector personnel and informed red tape: Their impact on motivation[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0, 20(1): 7-28.
- [9] Bozeman B. Bureaucracy and Red Tape [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0.
- [10] Pandey S K, Garnett J L. Exploring public sector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Testing a model and drawing implicati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 66(1): 37-51.
- [11] Bozenman B, Reed P N, Scott P G. Red tape and task delays i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2, 24(3): 290-322.
- [12] Rainey H G, Pandey S, Bozeman B.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rs perceptions of red tap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5, 55(6): 567-574.
- [13] Feeney M. K. Organizational red tape: A measurement experiment[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 22(3): 427-447.
- [14] Samina Q, Abdul K K. Red tape, resigned satisfacti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negative employe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esting a model of moderated mediation[J].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2015, 35(4): 307-332.
- [15] 迟福林, 张飞. 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6-11.
- [16]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 现状、问题与对策[J]. 管理世界, 2015, (6): 22-33.
- [17] 卫星华, 洪银兴, 魏杰. 论企业活力与企业行为约束[J]. 学术月刊, 1986, (5): 1-5.
- [18] 李维安, 袁庆宏.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活力塑造: 一个组织行为递进模型[J]. 经济管理, 2002, (24): 4-10.
- [19] Vicenzi R, Adkins G. A tool for assessing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in an era of complexity[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0, 64: 101-113.
- [20] Smith W S. Vitality in business: Executing a new strategy at Unilever[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009, 30(4): 31-41.
- [21] Bishwas S K.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 vitality based on strategic knowledge management[J]. Global Journal of e-Busines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1, 7(1): 45-52.
- [22] Davies R B. The silver lining of red tap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 101: 68-76.
- [23] Tiana S, Palmira L F. Trust as intangible asset: enabl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development by leadership for vitality and innovativeness[J].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3, 11(3): 244-255.
- [24] Savolainen T, Hakkinen S. Trusted to lead: Trustworthiness and its impact on leadership technology [EB/O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 Available: www.osbr.ca. 2011.
- [25] 钱锡红, 杨永福, 徐万里. 企业网络位置、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一个交互效应模型[J]. 管理世界, 2010, (5): 118-129.
- [26] Jiao H, Koo C K, Cui Y.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and firms' innovation in China: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ownership[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5, 96: 15-24.
- [27] 郑焯, 杨若愚, 姬晴晴. 企业创新绩效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十五年述评与展望[J]. 中国科技论坛, 2017, (3): 73-80.
- [28] 郑刚, 刘仿, 徐峰, 等. 非研发创新: 被忽视的中小企业创新另一面[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 (1): 140-146.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 to enterprise , enterprise vita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ZHENG Ye^{1,2} , WU Jian - nan^{3,4} , ZHANG Pan³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 Economics , and Law ,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 Xi' an 710072 , China;
2. Education Center of MPA ,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 Xi' an 710072 ,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30 , China;
4. Institute of Chinese Urban Governance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30 ,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 the academic world lack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s of governmental behavio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o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 with 457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s research object ,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o enterprise , enterprise vita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esides , empirical approaches are applied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o enterpris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indicated by the results ,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o enterpris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 namely simplify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giving autonomy to enterprises. Both of them can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vita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 the interaction of “simplify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giving autonomy to enterprise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vita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 enterprise vitality plays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in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mplify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ving autonomy to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but i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when it com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ving autonomy to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n this basis , the paper furth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 to enterprise; enterprise vitali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上接第 1706 页)

- [12] Layne - Farrar A , Lerner J. To join or not to join: Examining patent pool participation and rent sharing rul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2006 , 29 (2) : 294 - 303.
- [13] 张米尔 , 张美珍 , 冯永琴. 技术标准背景下的专利池演进及专利申请行为 [J]. 科研管理 , 2012 , 33 (7) : 67 - 73.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s diversified technology and network pos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patent pool

ZHANG Li - fei , WANG 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Trade ,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79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formation of patent pool from two aspects , i. e. ,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and network positions by adopting the USPTO retrieved 166 companies in the DVD industry as research samples. It argues that the network position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versified techn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patent poo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degree of enterprises diversified technology the more easily join the patent pool. The more central and intermediary positions in the network , the greater probability of added patent pool. Meanwhile , the network centrality and intermediary play a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ed techn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patent pool.

Key words: diversified technology; network centrality; network intermediary; patent pool